

第三章 合浦水运交通的繁荣期

二、两汉时期合浦地区的水运交通

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西汉墓出土的大铜鼓上有羽人划船纹饰，船下面前头似锚，后头似舵^[1]，生动地再现了汉代岭南水运的场景。合浦港及合浦城在两汉时期的发展，首先是得益于合浦郡的设立，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在中原王朝的体系下得到充分发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同时也进一步带动合浦当地的经济。在整个两汉时期，合浦通往中原的水运交通在军事需求的基础上，在商旅贸易、人员交流等因素的影响下，日益完善和繁荣，这也为合浦的海外贸易开拓了广大的腹地。

（一）西汉合浦郡治非徐闻考

合浦的发展与其在政区内的政治地理区位直接相关，合浦的繁荣直接受益于秦象郡、秦末南越国到西汉合浦郡的发展进程。合浦郡设置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是年，汉平定南越国，在秦所置桂林、南海、象三郡的基础上，在南越之地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增设儋耳、珠崖二郡。^[2]平定南海诸郡之事，在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有详细记载：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漓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3]

汉武帝平定南越的进军路线与秦军大致相同，但是较秦时更为明确。汉武帝派出的是四路军队，分别是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即从今湖南郴州，越骑田岭后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横浦”，即沿着豫章水（今赣江），越横浦关下湟水。戈船将军与下濑将军是水军将领的名号，可见归义的南方故军兵种不是骑兵，也不是车兵，而是舟兵。《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二将军“出零陵，下漓水”到达番禺，必须要利用秦始皇所凿通的灵渠。最后一军是驰义侯从长江上游出发，从巴蜀之地，携当地罪人，经夜郎地，也就是今贵州遵义一带，会合当地征发的兵士，沿牂牁江，从北盘江进军番禺。^[4]《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战况云：

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陋，破石门，得粤船粟，因推而前，挫粤锋，以粤数万人待伏波将军。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后期，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

面。会暮，楼船攻败粤人，纵火烧城。粤素闻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为营，遣使招降者，赐印绶，复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迟旦，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伏波又问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5]

相较于其他三路，伏波将军路博德与楼船将军杨仆比较顺利，而下濑将军、戈船将军以及驰义侯的军队皆因“道远失期”，最终会合时仅有千余人。伏波将军、楼船将军配合默契，路博德“遣使招降者，赐印绶”，杨仆则“力攻烧敌”，很快番禺城中“皆降伏波”，吕嘉等数百人只能逃亡海外。

苍梧王赵光与粤王同姓，闻汉兵至，降，为随桃侯。[及]粤揭阳令史定降汉，为安道侯。粤将毕取以军降，为瞭侯。粤桂林监居翁谕告瓠骆四十余万口降，为湘城侯。戈船、下濑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将军益封。楼船将军以推锋陷坚为将梁侯。^[6]

军事进程很顺利，最后虽然“戈船、下濑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但是“南粤已平”。在汉军大兵压境之下，当地的各种势力纷纷倒戈，除了南越国都城所在的番禺周边，沿海的大片地方也都迅速平定。在这一过程中，合浦已经显示出其重要的交通功能。《水经注》卷三七引《交州外域记》有载：

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越王，路将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贡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7]

汉军在合浦接受了交趾、九真两地首领的投降，顺势置郡。其后以合浦为基地，进一步平定周边，最终在更大的范围内，设置了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这一范围，已经超越了秦始皇时期当地的政区设置。

汉武帝置郡，合浦之名正式出现在史籍记载当中。合浦之名，意为“江河汇集于海的地方”^[8]。这当然是来自合浦境内南流江五条支流入海的地貌特征。不过，汉武帝置合浦郡的郡治的确切地点，目前仍存有争议，原因是文献中存在异说。一为《水经注》卷三六下所言：“郁水又东迳高要县，牢水注之，水南出交州合浦郡，（合浦郡）治合浦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9]一为《（嘉庆）大清一统志》“廉州府”下注所载：“合浦郡，初治徐闻，后汉移治（合浦县）。”^[10]

合浦与徐闻之争，学界已有一些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涉及历史地理文献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汉书·地理志》的首县问题。班固撰写《汉书·地理志》时，每

一个郡之下都详列其所属各县。其中的排列顺序，有学者认为存在一定的意义，每郡之下第一个列出的县学者将其称为“首县”，认为应当就是当时的郡治所在。而《汉书·地理志》合浦郡的记载为：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桓合。属交州。户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县五：徐闻，高凉，合浦，有关。莽曰桓亭。临允，牢水北入高要入郁，过郡三，行五百三十里。莽曰大允。朱卢，都尉治。^[11]

所以，《汉书·地理志》中合浦郡的首县是徐闻。这样说来，似乎《（嘉庆）大清一统志》的说法更为可信，但《水经注》的文献年代更早，而且合浦县与合浦郡同名，东汉以后一直为郡治，为始建郡时的治所，也十分可能。

1953年，严耕望在《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一文中支持《（嘉庆）大清一统志》的说法。他谈道：“合浦与儋耳、珠崖同时所置，合浦仅有今广西西南隅南尽雷州半岛之地，其时合浦县既当郡之中央，又与郡同名，自为郡治无疑。然昭帝罢儋耳郡，元帝罢珠崖郡，而《地志》合浦郡有朱卢县，《续志》作珠崖，吴卓信云‘盖即改故珠崖郡所置，是今之琼州一府为汉朱卢一县也。’……西汉末年，合浦兼有今海南之地，其时徐闻地当雷州半岛，地控海岛与大陆之要冲……是在汉世徐闻尤为海上交通之枢纽，吾人可以想象儋耳、珠崖两郡既罢为朱卢县，属合浦，则一中心为徐闻县，非合浦县，即就交通及军事控制言，徐闻亦远优于合浦，徙治合浦，极有可能。”

^[12]严耕望的观点是《汉书·地理志》合浦郡下首书的徐闻县应当是当时的郡治，当然，同时他还强调，《汉书·地理志》只是平帝末年的版籍，是一时之记载，而非整个西汉时期的情况皆是如此。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两汉的合浦郡治均标注在合浦县^[13]，为此，香港学者刘福注曾向出版社质疑。王文楚受谭其骧所托，作《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图几个郡国治所问题》一文答复刘福注。此文认为严耕望所言《汉书·地理志》首列之县都是郡国治所，恐未必尽然。“因《汉志》（指《汉书·地理志》）有错简，亦有少数虽是首列之县，而不是郡国治所，故修订时并未采用严说。”在解释合浦郡治问题时，王文楚引《汉书·贾捐传》记载“诸县更叛，连年不定”，认为“元帝遂接受贾捐之建议，弃珠崖郡。吴卓信以朱卢县为改珠崖郡所置，乃是误解……严说既罢儋耳、珠崖两郡为朱卢县，属合浦郡，郡治徙治海上交通枢纽的徐闻，更不可信，故修改本仍持原说”^[14]。

张荣芳、周永卫在《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一文中指出，徐闻在西汉是合浦郡的首县，即郡治所在地，到了东汉，合浦成为合浦郡的首县。同时根据1983年海南岛出土的一枚印有“朱庐执圭”的西汉银印，认为汉虽弃朱崖郡、儋耳郡，但仍然认识到

海南岛和琼州海峡的重要性，在与徐闻隔海相望的朱卢县保留县治，并把合浦都尉设立在那里，保留一定数量的军队。^[15]

雷坚编著的《广西建置沿革考录》中，通过引用《水经注》所载的《通典》下关于廉州和雷州的记载，说明廉州是“秦象郡地，汉置合浦郡，后汉同”。雷州也是秦象郡地，两汉以后并属合浦郡地。但是唐之廉州便是今合浦，雷州则位于今雷州半岛，徐闻在其中。由此可见，徐闻只是合浦郡地。^[16]

韩湖初认为，《续汉书·郡国志》中言“凡县名首书者，郡所治也”，同时，志中对郡、县的设置和改动都有记载，而合浦郡下并未见治所有改动的记载，故而两汉合浦郡治一直都在合浦县，并未改动。^[17]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将合浦与徐闻的出土文物进行对比，发现合浦汉墓较多，出土文物也较徐闻更为丰富，再结合汉代合浦的地理位置，可推出汉代合浦郡治应为合浦县。^[18]

为了更为直观地分析传世文献中关于合浦郡治的记载，现列表如下：

表 3-1 支持合浦郡治合浦县文献

时代	作者	出处	文本	备注
北魏	酈道元	《水经注》卷三六“温水注”	郁水又东迳高要县，牢水注之，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	
唐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八《岭南道五·钦州》	汉平南越，置合浦郡，今州即合浦郡之高凉县地也，在今高州界	今州指钦州，汉属合浦县
唐	杜佑	《通典》卷一八四《州郡十四·合浦郡》	廉州，秦象郡地，汉置合浦郡，后汉同	表明汉世合浦郡并未徙治
北宋	欧阳忞	《舆地广记》卷三七《广南西路·廉州》	廉州：古百越之地。秦属象郡，汉合浦郡。东汉因之。吴改曰珠官郡。晋复曰合浦……今县二。上合浦县；汉立合浦郡。吴曰珠官郡。晋复为合浦	
北宋	李昉等	《太平御览》卷一七二“廉州”引《方輿志》	廉州：合浦县，秦象郡地，汉置合浦郡，后汉同	
北宋	乐史	《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岭南道十三·太平军》	废廉州，在军北四十里。本秦象郡地。汉为合浦郡，元鼎六年置九郡	用“为”不用“属”，表明廉州为汉合浦郡治所
南宋	王象之	《舆地纪胜》卷一二〇《廉州》	汉平南越置合浦郡，今州即合浦郡理也。 合浦县条在称：倚郭，本汉合浦郡	郡理即郡治
南宋	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三二三《舆地考九·廉州》	廉州秦象郡地，汉置合浦郡，后汉同	
明	李贤等	《大明一统志》卷八二“防州府”	汉武平南粤置合浦郡，三国吴改珠官郡，未几复为合浦郡，刘宋于郡置越州，隋初郡废州存，大业初改曰禄州，寻改为合州，又废州为合浦郡，治合浦县	表明两汉、孙吴、刘宋、隋时期合浦郡均治合浦县

表 3-2 支持合浦郡治徐闻县文献

时代	作者	出处	文本	备注
清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卷一 ○四《广东五》	雷州府……古百越地。 秦属象郡。汉初属南越， 元鼎以后置合浦郡，治 徐闻县	同书又载：廉州汉曰合浦郡……宋 为越州治。而在记述合浦郡其他属 县地时说：雷州，汉合浦郡地。钦 州，汉合浦郡地。表明廉州为合浦 郡治，雷州等仅为汉合浦郡属地。 造成这种同书异说的原因很有可能是 各卷依据的文本不同，顾祖禹在 编纂《读史方輿纪要》时未加详审
清	许午	《（乾隆）大清一统志》 卷三四八“廉州”	汉为合浦郡之合浦县， 注：时郡治徐闻	
清	阮元	《广东通志》卷四《郡 县沿革表二》	元鼎六年置，治徐闻县， 后汉徙合浦县	

通过表 3-1 与表 3-2 的对比不难看出，清代以前的九种重要文献中对于西汉时期合浦郡治合浦县并无异议，且没有西汉前后徙治的记载。一般而言，越接近文献所反映时代的文献记载越具有说服力。反观三种支撑合浦郡治为徐闻的文献有两个特点：其一，年代不早于明代，距西汉 1000 多年；其二，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同书异说，可以解释为所依据文本有异，也可能是纂者本人对于西汉合浦郡治所并无确论。

邝道元并没有特别看重《汉书·地理志》首县的问题。所谓首县，是宋代以后学者在谈论《汉书·地理志》时逐渐提出的，但看《大明一统志》、明万历以及清康熙时期的《廉州志》，均没有提出过西汉合浦郡治为徐闻县，后迁至合浦县的说法，此后的地方志则沿用了《大清一统志》这一说法。也就是说，初治徐闻、后迁合浦应当是《汉书·地理志》首县作为其郡治的观点被编撰《大清一统志》的学者所认可的结果。这样看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处理办法是值得采信的，合浦应当始终是合浦郡的治所（必须指出的是，谭其骧将两汉合浦郡治所标注在今浦北县是错误的）。

（二）置郡后合浦港的经济繁荣

合浦地区虽然在秦置南海三郡时就已纳入中原王朝的范围，但是真正同中央确定稳定关系是在汉武帝设置合浦郡之后，这也为汉代合浦郡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合浦置郡以后，经济活跃，人口增加。《后汉书·郡国志》有载：

合浦郡武帝置。雒阳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五城，户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口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合浦、徐闻、高凉、临元、朱崖。^[19]

在汉以前，中原的移民就已进入合浦地区，两汉时期，合浦地区人口有所增长。司徒尚纪便认为，合浦地区得利于地理区位和湘桂走廊作为南北交通要道之便，在汉

王朝版图内，红河三角洲和环北部湾其他地区是汉王朝在南方的一个经济区。^[20]据梁方仲计算的西汉元始二年（2年）岭南人口密度，合浦郡为每平方千米1.4人，交趾郡为每平方千米9.6人，九真郡为每平方千米3人，而占今广东大部的南海郡为每平方千米1人，这远逊于前数郡。^[21]这就是说，虽然南海郡的番禺（广州）作为经济都会已经存在，但是珠江流域大多数地区尚未开发。城市和港口作为经济中心，其数量多寡和规模大小也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汉代，环北部湾地区就有龙编、赢楼、西卷、合浦、徐闻等港口和城市，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

合浦作为汉代对外贸易的窗口，经济发展是支撑。在农业方面，虽然《后汉书·孟尝传》记载“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留余粮食”，但是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在已经发掘的汉墓中，不仅发现了用铜碗装着谷物的随葬品，还有大量的陶制仓库模型（图3-2）。这些陶仓大多呈长方形，像一间平房，前有门，门槛较高，其余三面则是封闭的。这种防潮和容量设计，表明了无论是用珍珠换取粮食还是本地生产，合浦的粮食供应都是比较充足的。



图3-2 合浦出土的“东汉干栏式陶仓”

然而，合浦地方官吏大多贪渎，无节制地驱民采珠以自肥。后孟尝到任才“革易前弊”，合浦的采珠业得以重新出现“商货流通”的局面。此外，合浦的手工业也较发达，加丁工艺水平较高，其中青铜铸造工艺和玻璃烧制工艺最为突出。在汉代，岭南地区生产了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镂刻花纹的青铜器，这种器物在合浦汉墓中屡屡发现，应视为本地所生产。同时，在合浦汉墓中还有大量的玻璃制品（图3-3）随葬，这些玻璃制品既不是西方国家早期的“钠钙玻璃”，也有别于古代中原地区的“铅钡玻璃”，而是一种用北部湾地区的原料加工的“钾玻璃”。合浦的农业、手工业、采珠业等与港

口对外贸易发展相辅相成，促进了汉代合浦经济的繁荣。^[22]



图 3-3 合浦县文昌塔第一号汉墓出土的玻璃龟形佩饰^[23]

合浦县治所的变化与合浦采珠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两汉时期，相较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对于采珠业的管理并没有那么严格，使合浦的采珠业在商贸流通当中得以发展，而后地方官员日见其利，在《后汉书·孟尝传》当中记载，虽然孟尝“革易前弊”使合浦重新“商货流通”，但是朝廷显然已经注意到了合浦珠的利益，进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采珠业进行了严格管理。清代杜臻即在《粤闽巡视纪略》中提出：

但言钦廉土不宜谷，民用采珠为生，自古以然。商贾賈米易珠，官司欲得者从商市之而已。汉顺帝时桂阳太守文砮献大珠，诏却之，足知其非常贡。至孙吴黄武间，改合浦为珠官郡，始有官领采辨之事。然权非侈靡之主。史称其时魏主来求雀头香、明珠、翡翠、斗鸭、长鸣鸡。权曰：“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悉以与之。”已而，魏使又来，请以马易珠玕、璫（玳）瑁。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由是多取以应之，其意盖欲以权变弊敌国，如范蠡骄吴故事。然厉民已甚，难免作俑之讥矣。晋平吴，交州刺史陶璜请弛其禁，民困始苏。自宋迄隋，未尝复设。唐虽以珠池名县，官不采取，但以利民。^[24]

实际上，交州刺史陶璜上书所弛珠禁也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微适当放宽，即“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依然由朝廷对合浦采珠严格控制，加之官吏的贪腐以及盗采不绝，致使唐代中期“珠还旧浦”被视为祥瑞。可见在两汉以来，合浦的采珠业有衰落的迹象。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以及合浦地区的发展，农业得到发展，同时也伴随着合浦县地向南流江上游移动。廖幼华在《秦唐之间汉人在广西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三国时期广西的发展已形成以各个大流域为中心的模式，各郡辖县大多位于一条河流的主流及支流上，而郡治则落在大河交汇的交通枢纽位置，形成了一个依河系分散、自成小系统的城镇体系。^[25]显然近海的盐碱地并不适宜农作物特别是谷类的生长，这些方面都是合浦人口逐步向南流江上游迁徙，

远离海岸线发展的因素之一。

采珠业的生存与海岸线密切相关。《旧唐书》中有载：

(合浦)唐置廉州，大海在西南一百六十里，有珠母海，郡人采珠之所，云合浦也。^[26]

而在《太平寰宇记》中，关于“珠母海”的记载则更为详细：

珠母海，大海在县西南一百六十里。珠母之海去县八十里，采珠之所，即合浦也。凡珠珖出于蚌，蚌母广数寸，长尺余……围州。《交州记》云：“合浦十八里有围州，周围一百里，其地产珠。”^[27]

在这当中所记载的州或县，距离大海“一百六十里”，这显然比较符合今浦北县泉水镇旧州一带的廉州郡治以及合浦县治的位置所在。另外，《交州记》当中所记的“合浦十八里（注：此‘十八里’很可能是‘八十里’之误）有围州，周围一百里，其地产珠”很可能记载的是汉代合浦郡治，即今合浦县草鞋村遗址的位置，其产珠之地离合浦不远，同时也是临海的地理位置。这些都向我们揭示了，两汉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海岸线虽然在缓慢向外扩张，但依然离合浦县治所今廉州镇西南不远。

（三）两汉时期合浦的水运交通盛况

秦王朝统一以后，在全国性交通干线的建设方面颇有建树，奠定了后世官方修筑、维护的全国交通主干线的基础格局。秦凿通灵渠的同时，在北方修建驰道，在岭南修筑新道，正是这样，全国交通干线通畅，合浦在交通方面的区位优势才得以形成。到汉代，经过秦末割据、地方政治势力发展，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后合浦成为郡、县两级政区治所，政治地理区位优势叠加，合浦的繁荣是势所必然。

而汉武帝及之后统治者的精心经营，使得合浦在这一时期水陆交通日益繁盛。从武帝时起，在商人世家出身的经济官员桑弘羊的倡导下，整个大一统帝国在经济上实施行政与商业统一、经济活动高度依赖交通运转的“均输”政策，合浦这个连接海内外又是南方大郡的附郭县，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1.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合浦港

合浦所临的北部湾沿岸是中国南部洋流、季风、海上航线都十分理想的地区，促使其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发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贸易关系。在汉代，随着水运交通的不断完善，合浦郡同中原以及西南地区的交往也日益密切，合浦港成为中国远洋贸易和国内贸易衔接的中枢。

海船出海、回港，需要一片海湾作为锚地，这片锚地所在的位置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广西文物工作队石湾大浪古城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报告《合浦港的考古

实践与初步认识》中认为，大浪古城西汉遗址发现有码头遗存^[28]，应该是《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主体部分^[29]。而多数学者依据近代地方志的记载，如《(道光)廉州府志》：“廉郡合浦，附郭面海背山，南十里乾体海口，为廉州门户，乾体至冠头岭大观港数百里海面辽阔，迤外郡城。由乾体港过大观港、乌雷岭便到越南。”^[30]同时还参考地理位置等因素，认为乾体港才是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主体港口。^[31]

在合浦乾体港是否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讨论中，最为详细的是钟定世等的《论合浦乾体港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兼说乾体港(三汊港)的兴衰》，其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乾体港为西汉时期合浦的始发港：一是地理位置优越，乾体港位于北部湾沿岸中心，西南有北海冠头岭作为屏障阻挡风浪，同时位于江海汇合处；二是自然条件优越，乾体港西南面向大海，东北为丘陵地带，西北有南流江的冲积平原，农渔产品丰富，为港口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三是文献记载，即《廉州府志》《合浦县志》等记载乾体港的情况，并依据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的论断，认为马援“由乾体海口西过大观港、乌雷岭便到越南”便是《后汉书·马援列传》中记载的“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四是汉墓群陪葬物，认为以合浦汉墓的丰富程度，以及其呈现出逐渐由东北向西南乾体港方向移动的趋势，即城市发展趋势逐渐向乾体港靠拢，说明了乾体港是汉代合浦古港所在。此外，草鞋村遗址在2007~2012年进行部分发掘后，发现了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城址遗迹，遗址西南角很可能存在码头的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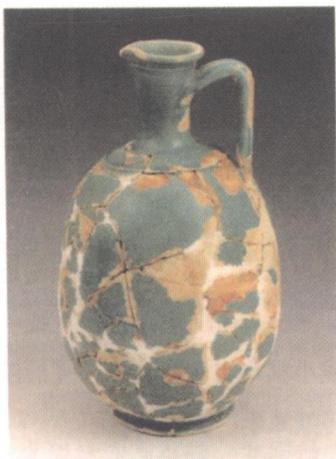
当然，还有一种思路，即合浦也许并非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唯一始发港口，北部湾可能存在一组港口连接着外洋航线，文献中笼统地被称作“合浦港”，其中包括今北海、铁山、沙田、大风江等天然港口。这种推断很合理，也符合当时由南流江入海处港口带动整个地区沿海港口的高度繁荣的情况。^[32]

在探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港的同时，应同时考虑汉代海岸线的问题。港口的设置与海岸线以及河流的变迁密切相关。通过对南流江三角洲沉积特征的勘探，可知南流江三角洲地区距今7000年以来，海平面基本在现今位置波动，沉积速度逐渐超过了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在古河口不同部位和不同时期沉积作用及海岸变迁有所差异，开始时河流沉积主要在北部，形成河流层序；随后河流将泥沙输送到河口区形成三角洲，海岸线向外推移而发生海退。目前南流江三角洲7000年来已向外推进了10~12千米^[33]。按每年平均1.6米的推进速度来看，在距今2000年左右的汉代，合浦的海岸线应向外推进7~9千米。与此同时，南流江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从东北向西南摆动延伸，西汉晚期至东汉的草鞋村遗址距离现在的出海口约10千米。大约2000年前，这个距离更近，约为3千米，都没有处于海边，而是位于内河，这与上述其他古代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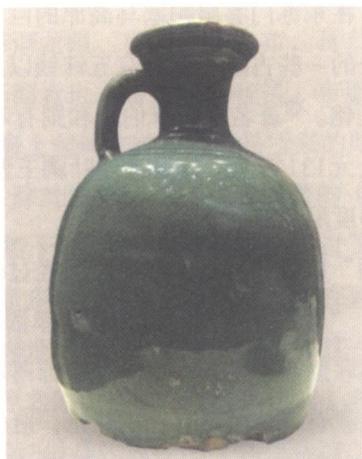
口所处的地理位置吻合。这种与现代港口的区别是由当时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条件决定的。此外，合浦草鞋村遗址可能存在码头，如果当时的码头位于城址的西北侧，就有可能被河流堆积物掩埋；如果码头正好在西南角，则有可能被河流侵蚀而不复存在。^[34]无论如何，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才能揭示更多的真相，复原远古的文明。

2. 两汉贡赋活动中的合浦港

在合浦对外贸易中，中国输出的主要是各类纺织品^[35]，而后在远洋贸易中购得当地奇珍异宝，再通过合浦以贡赋和贸易的形式进入中原地区。合浦通往中原的道路古已有之，地方特产以及舶来品也随之进入中原地区。（图 3-4）



1.合浦出土的青绿釉陶壶



2.大英博物馆馆藏的帕提亚青绿釉陶壶

图 3-4 合浦出土的青绿釉陶壶与大英博物馆馆藏的帕提亚青绿釉陶壶^[36]

汉代从合浦港出海的航船可以到达外洋诸多国家。廖国一在《汉代合浦郡的对外贸易及其重要意义》一文中，依据文献和考古学材料，对汉代合浦港出发向外海航行中经过的国家进行过复原。^[37]这些国家在《汉书·地理志》中有提及：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谿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糒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38]

“都元国”即印度尼西亚^[39]，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站，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留下了许多汉代文物。在东苏门答腊帕塞马高原的巨石文化遗迹中发现有西汉的雕像

和浮雕，此外，爪哇和加里曼丹的一些古墓中发现有五铢钱以及中国汉代的陶鼎，一些底部有西汉元帝“初元四年”的纪年题铭。^[40]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则有考证认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提及的“叶调国爪哇”，属印度尼西亚。^[41]

“邑卢没国”即缅甸。从合浦出发所经过的“邑卢没国”在今缅甸勃固附近，“谿离国”在今缅甸悉利，“夫甘都卢国”在今缅甸卑谬附近。^[42]缅甸在汉代尚未建立统一的王国，境内分布众多的部落联盟和小国，汉朝与这些部落联盟或小国均有贸易往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便记载有缅甸的熟忍乙王莫延，遣使“译献犀牛、大象”。

印度在汉称“身毒”“天竺”，《汉书·地理志》当中记载的“黄支国”是其属国，位置在今印度南部的康契普腊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

“皮宗”即新加坡，一般认为是今新加坡西面的皮散岛。^[43]新加坡位于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要冲，汉代合浦与印度等国的远洋贸易航线必定经过此处，在新加坡也出土过汉代的罐鼓。

“已程不国”即斯里兰卡^[44]。斯里兰卡被认为是古代欧亚大陆之间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西汉时期中国与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多至此而还，这是从合浦出发的西汉海上丝绸之路所到达的最远的国家。

北部湾和南海的季风气候为在合浦出行的船队提供了方便，但由于当时的航海技术还不发达，船只抵抗风浪的水平不高，续航能力有限，同时要尽量避免迷失方向和依赖海岸线的补给，一般采取沿海航行的办法。在到达一个陌生的地点时，还需要“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在这样的航行线路下，从合浦出发的船只经越南到达马来西亚^[45]，随后一路向西航行，到达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再以“黄支国”为起点，可能根据当地已有的航线，到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

《汉书·地理志》记载合浦等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韦昭注曰：“果谓龙眼、离支之属。布，葛布也。”颜师古注曰：“毒，音代；冒，音莫内反。玑谓珠之不圆者也，音祈，又音机。布谓诸杂细布皆是也。”可以看出，合浦运往中原的物产，既有经海上丝绸之路海外贸易所来的犀、象等珍奇异物，也有合浦本地所产的珍珠、龙眼、荔枝等。除此之外，西晋嵇含所著的《南方草木状》还记载了不少合浦所产的物种，包括吉利草、益智子、杉树、桂树^[46]，或通过贸易，或通过贡赋，也多被中原人士所熟知。加之“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表现了合浦在两汉时期是岭南地区商贸极为繁荣的地方。珠玑、玳瑁等均为沿海地区的水产品，而之后在这一区域内建立的珠崖郡、紫贝县、玳瑁县等地名，说

明合浦与中原之间由这些奇珍异宝形成了联系。

在这当中，尤以珍珠与荔枝、龙眼最为著名，最具代表性。“珠还合浦”的传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合浦沿海滩涂底平流缓，面积宽广，水质清澈，水温适宜，是珍珠生长繁殖的良好场所。珠玑之类早已见于史书记载，在《逸周书》当中便已作为南海的贡赋，《淮南子·人间训》也记载“始皇利越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可见合浦之地采集、使用和买卖珍珠很早。在《后汉书·循吏列传》中更是记载了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留余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返）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由此可见珍珠对于当地人的重要性，这当中也凸显了商贸对合浦的重要。荔枝和龙眼作为岭南地区的特产，广受中原人士以及皇宫贵族的喜爱和珍视，但由于路途遥远，其输入中原地区的数量极其有限。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官”尝试移植荔枝树，到了东汉和帝时期更是为了运输龙眼、荔枝到皇宫而“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险阻，死者继路”。正是贸易以及贡赋的需求，一方面促进了合浦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使合浦与中原地区的交通线路进一步改善和发展。

合浦北上中原的贡道，邓兰、梁旭达在《汉代合浦港及有关问题的探讨》文中有详细讨论。他们认为，“当时中原内地、云贵高原的货物，主要有三条通道进入合浦郡境内：一是湘漓水道。自秦始皇开凿灵渠后，此道便成为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沿长江水系由湘江过灵渠进入漓江，一路过桂门关，沿南流江到达合浦港口。二是红河水道。上源为南、北盘江。两江相汇后，经郁江、入玉林，最后沿南流江到达合浦港口。云南、贵州乃至四川的货物当时均可经此道输出海外。三是左、右江水道。右江水道源自驮娘江和云南东面的西洋江，两江相汇后经百色、田阳、田东，于南宁与左江相汇；左江上源由流经越南北面的红河、黑水河构成，两河汇合后经龙州、崇左、扶绥到达邕江。自邕江顺流至横县后上岸陆行至灵山一带，再从武利江经南流江到达合浦港”^[47]。所有这些编织成以合浦港为中心的水上交通网络，为开发和发展合浦港提供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王元林对合浦港向中原的交通线路则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两汉时期合浦通过西江和北江至中原的道路可以具体析分为六条。其中通过西江与中原相通有三条道路：一是灵渠道。因灵渠连接漓、湘两江，两江又分别是珠江、长江的支流，故从秦时起，这一交通孔道便成为岭南通往中原最重要的道路之一。二是林贺道（九嶷道）。此道从西江支流溯贺江而上，越过分水岭而达湘江支流潇水。三是夜郎道（牂牁江道），溯西江而上，或经今柳江，或经红水河（此水经岩溶地区，可能性不大），皆可到达古夜郎所在的牂牁郡（治今贵州凯里境），夜郎与巴蜀有五尺道相通。不过夜郎道经少数

民族地区，山高水险，还是难与以上两道相比。

而从北江与中原相通也有三条道路：一是桂阳道（湟水道）。从北江支流连江越过分水岭，沿湘江支流舂陵水可达湘江。桂阳县（治今广东连州）地控南北，为交通要冲。二是六泷道（武水道）。此道虽不见于秦、西汉之时，但东汉建武初，卫飒为桂阳太守，桂阳郡含涯（今广东英德境）、浈阳（治今广东英德东）、曲江（治今广东韶关南）三县，“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卫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此道后成为南海郡贡献荔枝的重要贡道，“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险阻，死者继路”。灵帝熹平三年（174年），桂阳太守周小景又开凿武水六泷，“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此道不断修凿，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三是横浦关道（浈水道）。此道由北江支流浈水而上，越横浦关，北上沿赣江支流章江而北上。《淮南子·人间训》载秦五路大军进攻越人，“一军守南野之界”，南野（今江西南康南）即在大庾岭北麓。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即走此道。因此道北上距两汉都城长安、洛阳较远，两汉时期此道不如以上北江两道重要。^[48]

在两汉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皆偏重在西部，这不仅体现在《汉书·地理志》当中所记载的户口人数上，在交通道路上也是如此。在上述道路中，岭南西部从越城岭到萌渚岭的灵渠道或潇贺道十分重要。^[49]此外，合浦通往中原还有一条海道常为人所忽略。《后汉书·郑弘传》曾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间阻，沉溺相系。”这当中所指的“旧交趾七郡”便包括合浦。^[50]这条道路十分艰难，因此，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峽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这样进一步将合浦前往中原的道路从单纯的水道变为水陆联运^[51]，从此合浦至中原的道路更加便利。

3. 两汉军事活动中的合浦港

合浦位于北部湾的东北端，其东连番禺，西控交趾。随着秦汉时期水运交通道路的开凿及不断完善，通过南流江北上可直达中原，通过合浦港口则可南通东南亚和印度洋。每逢交趾、日南等地发生叛乱，合浦均作为军队集结的大本营以及重要的军事补给基地。

邓家倍在《再论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一文中指出，从中原过灵渠、鬼门关到合浦的出海通道，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出于军事需要而开辟的。^[52]王元林、林杏容、邓敏锐在《两汉时期合浦郡在岭南与南海丝路的地位》一文中也指出，合浦通过西江、北江通中原六道，以灵渠道、临贺道、桂阳道、六泷道为要。长沙马王堆发现西汉长沙国南的《地形图》和《驻兵图》，都反映了汉初临贺、桂阳道的军事价值。

他们在文中还进一步分析岭南地区在两汉时期的大事件，认为岭南西部重大事件发生概率远远大于其东部地区，这就表明了合浦在岭南地区政治和军事地位的重要性。^[53]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国。次年，于岭南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据《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伏波将军路博德正是经过合浦平定交趾。虽然通过今云南也能到达交趾^[54]，但是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不仅要考虑能否到达，更要考虑物资运输等情况。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姊妹举兵反汉。《后汉书·马援列传》载：

又交趾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55]

马援同样通过以往的进军道路，即通过洞庭湖达湘江，过灵渠，再通过桂江、绣江、南流江，到达合浦。随后以合浦为军事基地，筹粮、造船、练兵，当地留下了许多马援的传说故事，正是当时马援在此驻留时间长所致。在完成作战准备后，马援“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吴小玲在《广西海上古运河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一文中，认为根据史料和传说，同时结合现存遗迹来看，广西沿海地区存在一条自东向西由合浦起，经钦州犀牛脚半岛、防城港光企半岛再接江山半岛出越南的通道。这条道路经历不同时代的多次开凿，便于船只近海航行，主要构成这一通道的是杨二涧、皇帝沟等。^[56]这些古运河的线路，最早很可能便是马援“随山刊道”而成，这条水运交通道路的形成不仅为马援平定交趾提供了支持，还有力地促进了合浦的海上贸易。

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援追征侧等至禁溪，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乃击牛酹酒，劳飧军士。从容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闲，虜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跼跼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今赖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诸君纡佩金紫，且喜且惭。”吏士皆伏称万岁。^[57]

在完成前期准备以及水运交通道路畅通后，马援随即进军，并很快平定了征侧、征贰的叛乱，并将其送往洛阳。马援因此得封新息侯，食邑三千户。马援在其封侯的

感慨中所言“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从侧面反映了岭南地区的环境恶劣以及进军途中困难重重。

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余人，峡南悉平。援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58]

随后，马援进一步进击九真，剿灭叛乱余党，很快“峡南悉平”。同时，在征战过程中，马援也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一区域的认识，因“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59]，并通过“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同时申明法律，促进了这一区域的发展。

汉安帝元初元年（114年），合浦等地“蛮夷”因不满地方官吏压迫，出现了反叛的情况，但很快便得到了平定。^[60]合浦作为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在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长时间保持稳定，为此地交通线路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两汉时期，合浦的水运交通因军事需要，在保障原有道路畅通的情况下，通往中原以及交趾等地的交通线路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4. 两汉移民迁徙中的合浦港

秦为了加强对新征服地区的控制，曾大规模向岭南地区移民。这些移民在南越王时期因赵佗治理有方，“中县人以故不耗减”。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61]除此之外，合浦地区的商旅也是络绎不绝，“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加之中原地区派遣的官员，以及因军事等各种原因遗留在合浦的人员，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合浦地区的发展。在这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东汉时期的合浦太守孟尝。《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

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余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62]

在这段记载中，反映了合浦最主要的特产便是珍珠，以及当地传统的商业交换方式即“海出宝珠，贸余粮食”。但是由于官吏的贪得无厌，导致合浦采珠业不断萎缩，民不聊生。孟尝到任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措施“革易前弊”，使得合浦百姓能够重拾采珠业，合浦得以恢复“商货流通”，因而受到百姓的爱戴。

“徙合浦”的罪人是两汉时期合浦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群。合浦虽然是两汉时期重要的出海口，但是其地远离中原，环境恶劣，“下潦上雾，毒气重熏，仰视飞鸢，砧砧堕水中”，导致马援所率领的军队在交趾“经瘴疫死者十四五”。故而在西汉中期以后，便将合浦郡作为流放罪人的集中区域。仅在《汉书》的记载当中便有十余起。如《汉书·王章传》载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京兆尹王章因得罪大将军王凤，下狱死。“妻子皆徙合浦。”《汉书·翟方进传》载，北地浩商被捕，伏诛，“家属徙合浦”。又如《汉书·元后传》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冬十一月，定陵侯淳于长因大逆不道罪，死狱中，“妻子当坐者徙合浦”。再如《汉书·平帝纪》载，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哀帝死，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贬哀帝傅皇后至桂宫，秋七月，将傅皇后父孔乡侯傅宴免官，“将妻子徙合浦”。《汉书·五行志》载，追废成帝赵皇后、哀帝傅皇后，皆自杀，“外家丁、傅皆免官爵，徙合浦，归故郡”。《汉书·五行志》载，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哀帝倬臣大司马董贤被免官，与妻皆自杀，“家徙合浦”。《汉书·佞幸传》载，董贤父光禄大夫董恭、弟驸马都尉宽信，皆免官爵，“与家属徙合浦”。还有《汉书·杜周传》卷六十载，诸前议立庙号尊号的杜业、董宏、师丹、朱博等人皆免官，“徙合浦”^[63]。《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卷七十七载，南郡太守毋将隆因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事被告发，被免官，“徙合浦”。《汉书·外戚传》卷九十七载，关内侯张由，诬告骨肉；中太仆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河内太守赵昌，陷害郑崇，皆不宜处中土，免为庶人，“徙合浦”。王莽废中山后卫氏，“徙合浦”。《汉书·王莽传》载，吕宽因诋毁王莽，全家“徙合浦”。宜陵侯息夫躬母，因祠灶祝诅，犯大逆不道罪，被弃市。息夫躬“妻充汉与家属徙合浦”。《汉书·蒯伍江息夫传》载，方阳侯孙宠、颍川都尉右师谭等，造作奸谋，罪及王者骨肉，不宜处爵位，在中土，皆免，“徙合浦”。《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卷八十六载，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郎中令冷褒、黄门郎段犹等，因造议为共王立庙京师事触怒王莽，“皆徙合浦”。这些材料皆为合浦存有大量来徙罪徒的证据。^[64]

蒋廷瑜在《再论汉代罪犯流徙合浦的问题》中总结，这些“徙合浦”的罪犯都是皇亲贵戚以及高官贵族，其家族势力庞大，在迁徙合浦后，汉朝官方并没有特定限制他们的行动，他们得以在合浦发展，例如京兆尹王章的妻子发展采珠产业，很快便“致产数百万”。在《后汉书》中可见流徙合浦的也有十余起，但明显更多的人被流放到了比合浦更南的九真、日南地区，这也说明合浦在西汉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较更南的地方发达，同时合浦远在五岭之外，其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成了官吏和士人的向往之所。^[65]

汉代客旅向合浦的流动，促进了合浦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并促进了合浦当地的发展。在此基础之上，人口频繁的流动迁徙，交通道路情况也日益为人所熟知，使合浦

从落后的边地，逐步发展为两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四) 大浪古城遗址与草鞋村遗址所见两汉合浦城市发展情况

以合浦县为中心的北部湾地区汉代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合浦县城附近发现了大量的汉代墓葬，即著名的“合浦汉墓群”。根据封土的情况判断，合浦汉墓群有墓葬 1056 座，是目前我国沿海地区最大型的汉代墓葬群之一。^[66]随后，在 20 世纪后半叶发现了合浦县石湾镇大浪古城遗址以及合浦县廉州镇草鞋村遗址。经过近年的系统考古发掘工作，大浪古城应建于西汉中期以前，草鞋村遗址主体则在东汉时期。从合浦汉墓和两个城址的规模和出土文物情况来看，汉代合浦县是一个人群密集的城市，商业繁荣，交通发达。

1. 大浪古城遗址与西汉合浦县治

大浪古城遗址位于合浦县城东北约 11 千米的石湾镇大浪村古城头村民小组，西有西门江往南流经县城后进入北部湾，距现入海口约 21 千米（图 3-5）。城址最初发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城墙被明代墓葬叠压，其年代被暂定为“明以前”。2002 年 9 月至 2003 年 4 月和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 月，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均为“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前身）和合浦县博物馆为配合汉代合浦港课题研究，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先后两次进行发掘，发掘点位于北城墙、城中部及西门外，发现有房屋遗址、码头遗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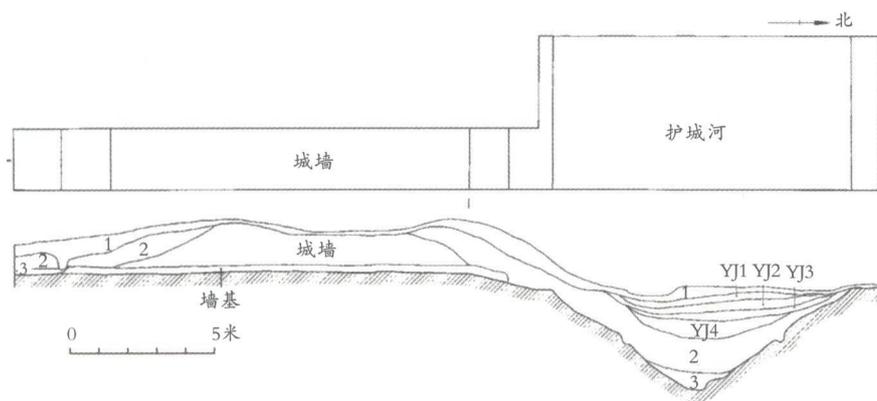


图 3-5 大浪古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目前，大浪古城遗址的轮廓仍较清楚，平面呈正方形，边长约 218 米。西面凭依

古河道，其余三面为护城河环绕，并与古河道相通。西城墙的南半部和南城几乎被破坏殆尽，仅东、北城墙保存较好，残宽5~20米，残高1~3米。城址内密布现代民居，城内堆积简单，仅有一层文化层，由于村民长期就地取土制砖建房，北部文化层大都缺失；南部是民居聚集区，破坏也相当严重，仅城址中部的堆积保存较好，文化层厚达0.2米。城址中共发现三个城门，各位于北、西、南城的中部，宽5~6米。残存的东北、东南和西北三个城墙拐角显得宽大，存在曾建有角楼的可能性。

在北城墙东、西两侧布设南北向探沟，其揭露的地层堆积情况如下（图3-6）：



1.灰黄色土YJ1~YJ4.灰黑色土 2.红黄色土 3.灰褐色土

图3-6 大浪古城遗址北城墙及护城河探沟平面图、剖面图

第一层：表土层。城墙位置为灰黄色土，顶部厚约0.1米。内外两侧的土略呈灰黑色，厚约0.2米。护城河位置的表土层下有淤积层，呈弧形分布，可分四小层，编号为YJ1~YJ4，均为灰黑色土，从土质看，应是城墙上方向水土流失所致。

第二层：近代扰乱层。红黄色土位于城墙的内外两侧，坡状堆积最厚处约1米。护城河内的堆积为灰黄色沙土杂红土，最厚处约1.1米。出土少量青花瓷片和几何形印纹硬陶片。

第三层：分布于城内及护城河底部。城内地层为灰褐色土，厚约0.2米。护城河底部的堆积夹杂少量淤沙和红土，中间最厚处0.6米。出土几何形印纹硬陶片。

第三层下为城墙和护城河。城墙的营造方式为，先用黑色黏土在平地上筑出宽14.65米、厚0.3米的墙基，黏土经拍打，致密结实。墙基内外两侧各内收约1.5米，往上再筑城墙。城墙的横剖面呈梯形，底部宽11.75米，残高1.4米，无法判断是否使用了版筑法。城墙土为纯净的黄土，局部夹杂小河卵石，未出土遗物。

城内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第一层：表土层。灰黑色土，质疏松，含较多腐殖质。厚0.26~0.46米。

第二层：近代扰乱层。灰黄色土，质松软。厚0~0.12米。出土少量瓦片、青花

瓷片和几何形印纹硬陶片。

第三层：文化层。灰褐色黏土，较疏松，含沙量大。厚0.8~0.22米。出土完整器极少，多为几何形印纹硬陶片，部分为夹砂陶片。此层下的遗迹有柱洞48个。

第三层下有一层红褐色土，表面较平整，土质纯净、致密，无包含物，厚0.14~0.22米，当为建筑物的垫土层。此层下的遗迹有坑3处。

共发现柱洞48个，被第三层叠压，打破垫土层和生土层，分布在城中部。柱洞平面多呈圆形，少量为椭圆形，壁直、斜直或分级内收，平底，部分用夹砂陶片或卵石垫底，有的填土中含炭屑。直径0.16~0.51米，深0.12~0.6米。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建筑规模和形制不详。

坑3处，被垫土层叠压，打破生土层。其中1个坑面积较大，形状呈椭圆形，长径4米，短径2.87米，深0.2米，填土为灰黑色，夹杂少量红烧土，出土陶匝1件。坑壁和底部不甚规则，亦无人工痕迹，应是自然形成，之后因建筑需要被填平。其余2个灰坑均较小，无出土物。

西门外堆积及码头遗迹堆积情况如下：

第一层：表土层。灰黑色土。厚0.2~0.42米。

第二层：近代扰乱层。灰黄色土。厚0.5~0.88米。出土青花瓷片和近代瓦片等，年代与城内的第二层相当。

第三层：黑色淤土层。厚约0.8米。仅见少量几何形印纹硬陶片，年代应与层内的第三层接近，为城址使用过程中或废弃后形成的堆积。此层下有码头遗迹。

第四层：粗沙层。较纯净，厚1.78米。无遗物。应为当时河道的底部堆积。

码头遗迹位于西城门外北侧的古河道旁，被第三层叠压，东与城墙紧邻。码头为土筑，上部距地表约2.5米。底部先用厚约0.15米的淤泥平整，上以灰黄色黏土筑实，表面未见夯窝痕迹。码头遗迹残长约7.4米，厚约1米。东侧宽约3.5米，往西呈弧形伸入古河道中，最宽处6.35米，这部分在古代也称“船步”。在码头西南侧边缘有2个相隔0.85米的柱洞，直径约0.15米，内残存木屑。在码头南侧有一平台与西城门相通，平台略呈弧形，长约8.5米，最宽处达1.75米，有6级台阶往下通到河边。正对西门也有明显的4级台阶抵达河边，最下面的2级台阶相对较缓（图3-7）。

大浪古城遗址发掘部分出土遗物，数量不多，主要为陶片，仅陶匝可复原，其他还有砾石。出土的陶片烧成温度高，纹饰纤细繁缛，与此前合浦汉墓出土的西汉晚期遗物迥然不同。关于几何形印纹硬陶片的断代，学术界的认识逐渐深入。考古工作者于20世纪80年代初介绍了广西21个市、县的57处几何形印纹硬陶片分布地点的概况，对它们的年代提出了初步看法，其中方框对角线纹（复线交叉纹）见于战国时期，下限可能到西汉初。方框对角线纹在广州西汉早期墓中也很普遍，带这种纹饰的陶器

的陶质、陶色都与大浪古城遗址所出极为相似。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方框对角线纹的年代下限被认为可以延至西汉早期甚至中期。出土的带短流陶匜与2003年在广州市萝岗区园岗山发现的一座越人墓所出同类器基本相同，报告者认为该墓年代为战国晚期，其下限可至秦汉之际。从合浦当地文化发展的滞后性及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始设县治的时间来考虑，城址的年代应定为西汉中期。年代判断参考碳-14测年结果，选取建筑遗址和码头残存的4个柱洞残余的炭样和木屑，送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测试，结果分别为距今2540年、距今1690年、距今2540年、距今2330年（未经树轮校正，误差为±60年）。大浪古城遗址应是西汉中期的合浦县治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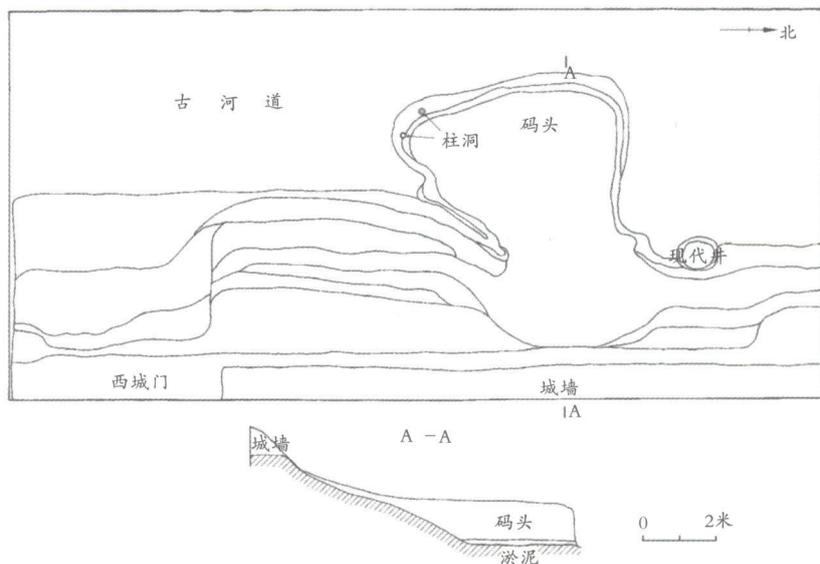


图 3-7 大浪古城码头遗迹平面图、剖面图

此次发掘所见的码头遗迹地层叠压清楚，虽经过漫长岁月，但夯筑的弧形平台、台阶及伸出江面供停靠船只和装卸货物的“船步”等都清晰可见，与现代沿江伸出水面的小型码头相似。这里河流宽阔，水势平缓，且离入海口不远，为停靠船只、转运货物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从单薄的堆积来看，该城使用的时间短暂，从西汉晚期起，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合浦县治所可能顺江南迁至今县城西南面的草鞋村遗址一带。草鞋村地处南流江三角洲，地势开阔，且离北部湾更近，自然条件要优于大浪村。^[67]

2. 草鞋村遗址与东汉合浦郡治

草鞋村遗址位于合浦县城廉州镇草鞋村西侧的一座小岭上，西临南流江的支流西门江，距现入海口约10千米（图3-8）。遗址于20世纪80年代经调查发现，2007年11月至2012年1月对位于遗址西北部的手工业作坊区共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城墙和护城河，城址周长约1300米，东、南、北三面城墙较平直，有护城河环绕，并与西门江相通。手工业作坊区和建筑遗迹的发掘点分别定位为A区和B区，两区以

只供阅读使用

一条 20 世纪 60 年代开挖的人工河分隔。A 区采用象限法下分 I、II、III、IV 四个象限，共布南北向 5 米×5 米探方 121 个、5 米×4 米探方 2 个，B 区共布南北向 5 米×5 米探方 33 个。



图 3-8 广西合浦县草鞋村汉代遗址位置示意图

地层堆积依照土质、土色和包含物，遗址地层可分为 7 层。A 区的地层：第 1、2、5 层全区分布；第 3 层主要分布在 III 象限，偶见于 I、II 象限；第 4 层仅分布在 I 象限东部；第 6、7 层分布在 I、IV 象限。B 区的发掘区缺第 3、5、6 层，B 区的 TG1 缺第 4a、5~7 层。（图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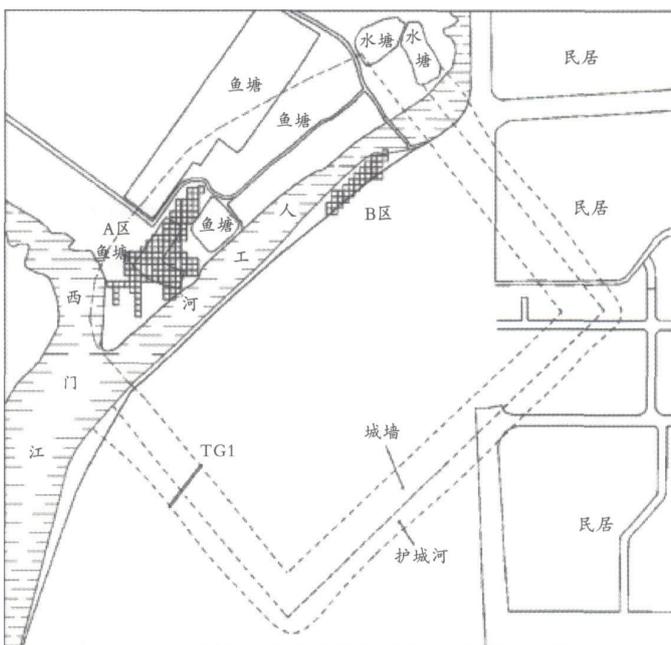


图 3-9 合浦县草鞋村汉代遗址发掘点位置示意图

遗迹根据地层分为四期。第一期：分布于A区北部和中部，叠压于第7层下，有沟和柱洞，因保护多未发掘。第二期：分布于A区，叠压于第6层下，有沟、作坊池、房址、圉泥坑和井等。第三期：分布于A区，叠压于第5层下，有成组的作坊池、工作坑、房址、沟、台、井等。第四期：A、B两区均有分布，叠压于第4b层下，主要为B区的建筑遗迹，另有少量排水沟、井、灶等。

草鞋村遗址一带居民密集，历代生产活动对遗址破坏很严重，特别是B区上部多为现代房屋叠压，难以扩大勘探和发掘范围，对遗址的整体布局目前不甚明了。初步判断遗址的年代第一期仅出土少量几何形印纹硬陶片，所饰“米”字纹、方格纹等为岭南西汉早、中期常见；第二期出土陶器以方格纹和方格加圆形、方形、菱形戳印纹为主，与合浦西汉晚期墓所出相同。第一、第二期出现的瓦当、筒瓦等与广州南越宫苑遗址第二期相似，出土的2份木块和1份藤条样品经意大利那不勒斯第二大学实验室的碳-14测试，年代分别为距今 2165 ± 40 年、距今 1927 ± 76 年和距今 2120 ± 35 年。第三期出土的瓦片、瓦当数量较第二期多，其形制与广州南越宫苑遗址第三期相似，年代属于东汉早、中期；第四期所出筒瓦、板瓦等，与广州南越宫苑遗址第四期相似，同时所出陶釜与合浦岭脚三国墓所出陶釜形制相同，所出陶碗与寮尾三国墓出土的陶碗形制相近。第三、第四期年代为东汉晚期至三国。

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初，草鞋村遗址东、南、北三面还保留有轮廓较为清晰的城墙和护城河，这种一面临江、三面开挖护城河与江河相通的布局与西汉中期前后的大浪古城遗址相似。城的构筑年代则因为发掘面积有限，目前还很难得出结论。发掘显示，城墙叠压在第四层下，为筑造年代的下限，即不晚于东汉晚期至三国。其上限或为出现大量建筑材料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即最早可能至西汉晚期。类似在平地挖基槽筑造城墙的做法已见于西汉中期的广西兴安县七里圩王城，草鞋村遗址稍晚出现在广西南部是完全有可能的。草鞋村遗址是合浦境内发现的这一时期唯一的一座城址，从其规模来看，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相当于被推测为县城的大浪古城遗址的两倍多，等级应更高。综合分析，草鞋村遗址应是东汉合浦郡的郡城。发掘成果还表明，西汉中期这一带已有人活动，第二、第三期出现的手工业作坊，当是就近满足大量建筑材料的需求。^[68]

合浦地区的建郡置县是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之后，而在此之前，这一区域内已有人群活动的痕迹。大浪古城遗址中虽然陶片等出土较少，但是第三层中出土的几何形印纹硬陶片已显示大浪古城遗址可能是西汉中期以前的城址，第三层下有城墙及码头的遗迹，说明了在西汉中期时，大浪古城以及码头便已存在，正如考古发掘报告中认为的那样，可能是西汉合浦县的县治所在。但是大浪古城遗址文化层相对较薄，遗迹也较少，说明了这一城址的使用时间短暂，很快便废弃了，这还可能

说明这个城址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群聚居区域，而是因为军事需要所建。此外，大浪古城遗址在今合浦县城东北方向，距今出海口约 21 千米，即使在汉代时，此城址到海边的距离也超过 10 千米，这显然不利于合浦地区海边养珠的传统，以及进一步以珠易米。考古报告中即推测县治在西汉晚期就已经迁往地理位置更加优越的草鞋村。

从草鞋村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在第七层下可能仍有遗迹，因保护的需要而未进行发掘。草鞋村遗址的第一期遗物所出土的几何形印纹硬陶片是西汉早、中期所常见，而城墙叠压在第 4b 层下，同时被 G2、G3 打破，其城墙的建成年代考古报告中认为上限为西汉晚期，下限为三国时期。从目前发掘情况看，即使这一区域城址的建成时间较晚，但也显示出草鞋村遗址在西汉乃至西汉早期即有人群聚居于此，故而在之后作为县治乃至郡治均是有其人群基础的。

在考古遗迹以及地质学的勘探中，合浦草鞋村遗址作为东汉时期郡治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在今合浦县城的北、东、南三面 5 千米范围皆发现有汉代墓葬，且数量客观，对整个城区形成包围态势，而县城西面则未发现有汉墓。（图 3-10）

广西民族博物馆课题组在对海岸线进行考察的同时，对合浦党江镇的地址情况进行了勘探，并认为：“党江位于合浦县城西南 4 千米处，离现在海岸约 5 千米，处于南流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势低平，除局部台地稍高外，大多地方海拔高度不足 2 米。因南流江入海口海堤的建设，形成现在大片陆地的景观。另外，在党江附近的南流江两岸，依然生长着大片的红树林，这种生长于半咸水的植物，强烈指示合浦县城廉州镇西南的大片区域，近现代仍然是海陆交互作用的地方。如果不是围垦海堤的建设阻隔了海洋的侵入，这个区域的很大一部分应该是潮间带的环境。”这进一步证明了在汉代，合浦西面即便不临海，也距海不远。发现于合浦县城西南部的合浦草鞋村遗址正好在这样的位置上，其整个遗址面积也基本符合作为一个郡治的要求，基本可以认定为东汉时期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同时根据《广西合浦县草鞋村汉代遗址发掘简报》，合浦草鞋村出土有从西汉初期至西汉晚期的遗物，这也说明这个遗址是从西汉发展而来。若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合浦县在两汉时期一直是合浦郡的郡治所在，那么将合浦草鞋村作为西汉时期的郡治也并非全无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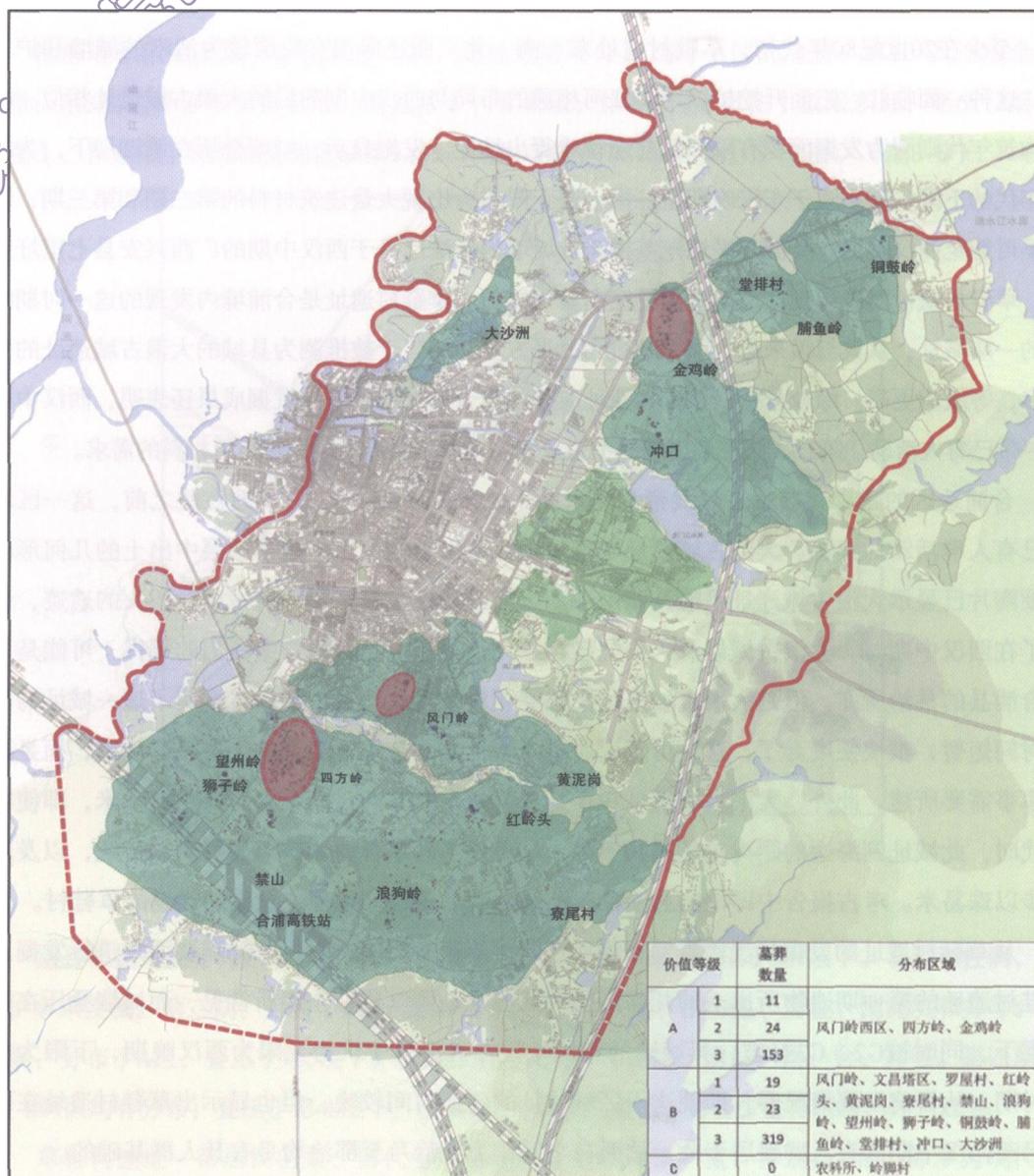


图 3-10 合浦汉墓群分布图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第 28 页。

[2]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武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88 页。

[3] 同[42]，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 3857 页。

[4] 王元林：《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 年第 23 卷第 4 辑，第 45-56 页。

- [5] [东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年, 第3857-3858页。
- [6] 同[5], 第3858-3859页。
- [7] [北魏]酈道元著, 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七《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年, 第860页。
- [8] 一说合浦之名为壮语“乌浒”音译成汉语“合浦”, “乌浒”或为生活在当地民族的称谓。《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南蛮, 今乌浒人是也。”见合浦县人民政府、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8页。
- [9] [北魏]酈道元著, 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六《温水》引《交州外域记》,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年, 第833页。
- [10]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四五〇《廉州府》,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 第十册第651页。
- [11] [东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年, 第1630页。
- [12] 严耕望:《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 载《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中),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 第601-602页。
- [13]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6年, 第35-36、63-64页。
- [14] 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年, 第344页。严耕望虽然在其《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中对该文进行了回应, 但是对合浦郡的问题却未有一词。
- [15] 张荣芳、周永卫:《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第1-8页。
- [16] 雷坚:《广西建置沿革考录》,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6年, 第99-100页。
- [17] 韩湖初:《两汉时期合浦一直是郡治所在——读(后汉书·郡国志)序》, 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年, 第108-110页。
- [18] 还有多篇论文涉及合浦郡治所在的讨论, 如蒋廷瑜、彭书琳:《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几个问题》, 载《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岭南文史》2002年增刊, 第104-109页; 胡运动:《古代合浦郡治考辨》, 《广西地方志》2016年第4期, 第56-60页; 陈洪波:《两汉合浦郡治及始发港问题研究述评》, 载周长山、林强主编《历史, 环境与边疆》,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104-109页; 等等。
- [19] [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一一三《郡国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年, 第3531页。
- [20] 司徒尚纪、许桂灵:《合浦港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年, 第51页。
- [21]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 第17页。
- [22] 黄铮:《广西合浦: 我国最早最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 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年, 第62页。
- [23] 玻璃龟形佩饰, 1985年合浦县文昌塔第一号西汉墓出土, 椭圆形, 中间凸起, 有四只爪, 爪呈三叉形, 头尾的形状与爪形相似, 头部中心穿一小孔, 是一种吊挂佩饰, 有人称之为角轮形环。此佩饰透明, 青绿色, 开冰裂纹, 长5.5cm、宽2.1cm、厚0.95cm。经分析, 含氧化硅77.87%, 氧化钾16.97%, 属于 K_2O-SiO_2 玻璃系统(G26)。对于这种装饰品, 越南国家社会科学与人文中心考古学院的阮长期于1996年由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越南古代玻璃器》(越南文)一书中认为, 龟形器的爪形与越南沙黄遗址出土的玉环或玻璃饰的爪形相似, 是用玻璃条加工成型的, 我国广东省石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环也有类似的四个龟爪形。参见黄启善:《广西北部湾地区汉代玻璃制品研究》, 载廖国一、黄启善等著《广西北部湾地区出土汉代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年, 第18页。
- [24] [清]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一, 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第16页。

- [25] 廖幼华：《秦唐之间汉人在广西的发展》，载徐杰舜、周建新编《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人类学高级论坛 2002 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70-371 页。
- [26]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一《志第二十一·地理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712 页。
- [27] [北宋]乐史编《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岭南道十三》，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3228 页。
- [28] 对于该码头的遗存是否为汉代遗址，陆露、张居英在其文中根据《方志》《輿地广记》记载，同时结合考古材料和地质资料分析，认为大浪古港并非西汉的合浦港址，而是北宋时期廉州治所的遗址。见陆露、张居英：《西汉合浦港口考辨》，《广西民族研究》2007 年第 1 期，第 172-178 页。
- [29] 转引自张九皋：《汉代合浦港港址论证引发的思考》，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25 页。
- [30] 《(道光)廉州府志》，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三)，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年，第 37 页上栏。
- [31] 持此说的包括周家干《汉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觅踪》、刘明贤《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范翔宇《乾江古港——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钟定世等《论合浦乾体港是我国古代海上丝路的的最早始发港》以及韩湖初《对石湾大浪古港为合浦古港的质疑》。
- [32] 张九皋：《合浦港是西汉“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始发港》，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20 页。
- [33] 黎广钊、刘敬合、方国祥：《南流江三角洲沉积特征及其环境演变》，《广西科学》1994 年第 3 期，第 21-25 页。
- [34] 广西民族博物馆课题组：《南流江出海口历史上海岸线变迁及汉代港口位置》，2012 年 4 月。
- [35] 在东南亚以及南亚诸国发现的汉代遗物包括陶器、罐鼓、五铢钱等器物，说明除丝绸外，在汉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物品以生活用品、消耗品及易耗品居多。参见廖国一、黄启善等著《广西北部湾地区出土汉代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 67-152 页。该书的“贸易与商业”部分对海外出土文物有介绍和分析。
- [36] 黄珊、熊昭明、赵春燕：《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墓出土青绿釉陶壶研究》，《考古》2013 年第 8 期，第 87-96 页。该文通过对比合浦县寮尾东汉墓出土的青绿釉陶壶与大英博物馆馆藏的帕提亚王朝时期的青绿釉陶壶以及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西汉青绿釉陶壶的形制，认为合浦县寮尾汉墓出土的青绿釉陶壶应是一件舶来品，其原产地应是今伊朗西南部或伊拉克，生产年代在 43~200 年，属于帕提亚王朝即《后汉书》中提到的安息。
- [37]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所到各国的内容均参见廖国一：《汉代合浦郡的对外贸易及其重要意义》，载廖国一、黄启善等著《广西北部湾地区出土汉代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 73-77 页。
- [38]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671 页。
- [39] 袁钟仁：《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载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等编《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67-92 页。
- [40] 杨万秀：《中外历史的探索借鉴》，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 年，第 274 页。
- [41] 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年，第 448 页。
- [42] 黄铮主编《广西对外开放港口：历史·现状·前景》，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7 页。
- [43] 李炳东：《广西对外贸易的历史概述》，《广西社会科学》1994 年第 1 期，第 61-66 页。
- [44] 韩振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未段考释》，《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 1957 年第 2 期，第 195-227 页。
- [45] 廖国一等认为，虽然汉代史籍当中未见到有关于马来西亚的记载，但从航行的线路来看，必定经过马来半岛附近。考古方面，在马来西亚发现有秦汉的陶片，同时合浦西汉墓中出土的人形足铜盘也认为是马来西亚人的物品。见廖国一：《汉代合浦郡的对外贸易及其重要意义》，载廖国一、黄启善等著《广西北部

湾地区出土汉代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3-77页。

[46] [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宋百川学海本，第3-5页。

[47] 邓兰、梁旭达：《汉代合浦港及有关问题的探讨》，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87页。

[48] 王元林：《两汉合浦、徐闻与南海丝路的关系》，《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第86-89页。

[49] 王元林：《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3卷第4辑，第45-56页。司徒尚纪也在《合浦港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中指出，唐代以前岭南交通重心偏西。

[50] 李贤等在为《后汉书》作注时，曾在《光武帝纪上》“交趾牧邓让率七郡太守遣使丰贡”条据《续汉书》指出七郡谓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

[51] 韩光辉、张宝秀：《广西南流江与北流江的联水陆运和郁林城市的兴起》，《地理科学》1992年第2期，第135-142页。

[52] 邓家信：《再论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53] 王元林、林杏容、邓敏锐：《两汉时期合浦郡在岭南与南海丝路的地位》，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

[54] 张金莲：《六世纪前的交趾与内地交通》，《学术探索》2005年第1期，第109-114页。

[55]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38-840页。

[56] 吴小玲：《广西海上古运河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第1-6页。

[57] 同[55]。

[58]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38-840页。

[59] 西于、封溪、望海均位于今越南河内北部。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63-64页。

[60] 见于《后汉书·孝安帝纪第五》《后汉书·五行志》及《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61] 同[58]，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6页。

[62] 同[58]，卷七六《循吏列传》，第2473页。

[63] “诸前议立庙号尊号的杜业、董宏、师丹、朱博等人皆免官，‘徙合浦’”存疑。师丹在汉哀帝以立庙尊号中和王莽同持反对意见，师丹不曾被徙往合浦。杜业，根据《汉书》卷八十五《谷永杜业传》，杜业没有被徙往合浦，只是免官归故郡。此外，在《汉书》卷六一《杜周传》中记载“哀帝崩，王莽秉政，诸前议立庙尊号这皆免徙合浦。业以前罢黜，故见润略”。关于“润略”一词，颜师古注曰：“润略谓宽纵不问也”。也就是说杜业由于之前已经免官，因此没有被徙往合浦。根据《汉书》卷八三《薛宣朱博传》，朱博在诏狱自杀，也没有徙合浦。

[64] 蒋廷瑜：《略论汉“徙合浦”》，《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1期，第87-90页。

[65] 蒋廷瑜：《再论汉代罪犯流徙合浦的问题》，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10-213页。

[66] 廖国一、黄启善等著《广西北部湾地区出土汉代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67] 以上关于大浪古城遗址的发掘报告资料及图片均来自熊昭明：《广西合浦县大浪古城址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8期，第41-49页。

[68] 以上关于合浦县草鞋村遗址的发掘报告资料及图片均来自熊昭明、富霞、陈启流：《广西合浦县草鞋村汉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8期，第50-74页。